

■ 教育研究

规范·偏离·控制:母语素养的 层级结构及其教育学启示^①

曾晓洁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系,湖南长沙 410205)

摘要:我国母语教育侧重规范的传统有失偏颇,因为理想的母语素养除了指向标准的规范力外,还包括指向修辞的偏离力和指向高效交流的调控力。常规性的学校母语教育应把母语素养的宏观分层作为课程设置的基点,使课程内容体现出一定的序列性,而补偿式的社会母语教育则应根据受教者实际所缺层面进行有针对性的多样化补偿。

关键词:母语素养;层级性;教育学启示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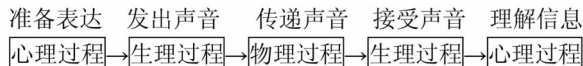
文章编号:1672-7835(2013)06-0128-03

从洪堡特到海德格尔,从萨丕尔到沃尔夫,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活在语言里”早已得到了充分的阐释。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才能更好地活在语言里?语言教育者的回答是——进行母语学习。他们认为,“母语学习可以帮助个体实现所潜藏的巨大能量。”^{[1]48}这种对于母语学习价值的判断,无疑是正确而令人振奋的。但要使母语学习的价值最大化,还须先认清母语素养的内在结构。

一 母语素养的三个层面

(一)规范是交流的根基

语言是每个社会人展示自我的最重要的途径,语言教育则是使人社会化的最基础的教育。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F. de Saussure)曾描述过一次简单的言语循环过程^{[2]32-34},简洁图示如下: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一次一来一往的简单交谈过程中,与所表达的含义有着决定性关系的只是两个心理过程(说者想说的和听者所理解的),而人的心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影响,或者说,就是个人社会经历与见闻的积淀析化。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内容并非个人所能全部决定。更重要的是,语言为沟通而存在,对于

个体而言,社会语言系统是先在的,它为某个语言族群所公认并且为所有生活其中者共同遵守,个体要想融入这个系统,必须首先接受这个语言系统的基本规则。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合约,在这样的合约基础上,个体才获得语言准入。共同语音、通用词汇、规范语法,就是约定俗成必须遵守的基本语言运用规则,这些规则的掌握是母语素养的第一层面。

(二)偏离产生修辞美

规范地言说只是实现了语言的低端功能。“言为心声”“文如其人”,这两个经历汉文化几千年淘涤的成语揭示了人文科学中一个不证自明的公理,即:共性的语言只是一种理论,事实的言语却往往是个性化的。或者说,规范本身是合同化的,它只是一个框架,如果仅仅囿于规范,则只能进行最基本的社会交流,没有多少生气;适度的偏离则不仅能产生新奇之美,还可推进语言规范本身的发展,产生灵动的言语诗意。

国内最先提出语言偏离理论的是王希杰,他认为,如果以语言规范为坐标,那么,规范的话语是零度偏离,错误的话语为负偏离,修辞为正偏离^{[3]22-37}。当然,正偏离产生的修辞决不仅仅是修辞格,它指向的是对基本语言规则的陌生化。语用论者公认,在具体的语境中,语法必须服从修辞,每一次有意义的言语过程都是为特定语境而生,规范层面的语言能力可以在基本规则的基础上生成新的应对性言语,却不能营造出新奇的意象,适当的正偏离则能充分利用语境的给

① 收稿日期:2013-03-21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课题青年项目(11B028);湖南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小学教师教育研究基地研究成果;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专项重点资助项目(XJK012AYW004)

作者简介:曾晓洁(1974-),女,湖南洞口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语言教育研究。

意限定性,创生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奇意象。

“人是修辞的动物。”^[4]某种意义上,我们并不是活在物质环境中,而是活在语言的玩味里,修辞是展现“我”之为“我”的最重要途径。通过对规范的正偏离,言说者用独特的方式表达自我的情感、体验和判断,在与他者言语形式的区别中,“我”的精神与言语一起实现了自由发展,“我”的形象通过修辞得以在人之群像中凸现、丰富,“我”也因此成为了“我”。因此,正偏离是语言素养的第二个层面。

(三)控制是语用的最高追求

发生了正偏离的言语,因为与受众固有的基于语言规范而形成的心理预设间存在落差,从而使受众获得意外之美或势能释放之轻松感。这种超越规则的自由抒发,因连带的新奇之美而颇受欢迎,也给言说者本人带来言语享受的快乐,对于个体语言成长意义非凡,但如果仅仅陶醉于个性化自我抒写而不留神言语的社会功能,则“我”之于世界的意义难免会因此折损。如何通过言语交流,使外在于“我”者成为“你”而不是“他”,从而高水平实现“我”之社交价值?言语控制力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词。

控制,意指掌握住不使任意活动或超出范围。话语控场力弱者,往往遭遇无从言说的尴尬或附和他人的无聊,成为话轮交替中的失语者。当然,失语大概有两种原因,一是由于地位卑微导致的话语权丧失,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是其典型代表,二是由于母语控场力的缺乏,敏于事而讷于言是其典型表征。这第二种情状的失语者,尤其需要培养话语控制力。祝敏青曾从控制论的角度,提出过“言语交际过程也是一种话语控制过程”^[5],虽然她重点论述的是话语施受双方在话轮中地位转换所构成的语境,但却为话语控制能力的提出提供了思路。再往前追查,可以发现早在1970年福柯(Michel Foucault)就已提出话语既是手段又是目的、话语的目的直接体现为权力的观点^[6]。言语控制即通过“我”之判断,凭借话语本身的吸引力、说服力或慑服力而非社会地位或其他外在因素,使言说主体能够通过言说来获得话语权,提升个体影响力,使言语交流能朝向“我”所希望的方向而发展。

也就是说,语言的最高效用是能根据语用环境进行成功的交际,诗意不一定能导向成功的言语交际,而在规范与偏离之基础上的控制则能引领言语走向一种圆融的高效境界。这种境界能让言说主体在享受言说幸福的同时实现生命与社会的双重价值。成功的话语控制依赖应情应景的分析和机智的语言反应,话语控制力是母语素养的最高层面。

二 母语素养层级性的教育学启示

(一)母语教育传统习于规训

查检我国语言规范史得知,我国的社会母语教育传统是由专家引领语言教育。这里的专家,指的是语言文字工作者,他们制定国家语言政策,并通过国家语言政策和学术言论影响社会语言教育的走向。在戴昭铭明确提出规范观念应变匡谬正俗为动态规范^[7]之前,我国的主流语言工作者都习惯于站在正统的立场,维护语言的既有现状,做匡谬正俗者。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曾从人性的角度指出,有机生命有一种天然的促使自身恢复到早先状态的惰性倾向^[8]。但这一共通的人性与社会语言演变情况

相悖。语言的演变与社会的应用同步,它把外语中、方言中适合当前时代需要的实用成分吸纳进来,生动活泼地对已有成分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应用,并毫不犹豫地不合时宜的原有成分抛在来途之上,总而言之,她要与社会同行,而决不会停留在历史的时空里孤芳自赏。结果,虽然从连续体来看,语言的变化点点滴滴、不成体系,但跳跃性地看,语言的变化又是巨大的,跳过几个历史阶段,把古今语言进行对比,人们会惊讶地发现,今天的语言与当初的语言确乎已经堪称陌路。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的语言工作者还都醉心于从历史状态中寻找语言现象的存在理据,用源自历史语言考证得来的学理确定新的语言现象之不合理性。

学校语言教育是社会语言教育的最直接的应和者,社会母语教育通过语言政策、课程标准、考试制度等形式渗透到学校语言教育当中。社会母语教育以基于历史状态的严肃规训为导向,学校语言教育,尤其是中小学语言教育,自然也以言语规范的教学为最高原则,从而使得每一个新的语言成分要被规范所接受而登入正统教育的大雅之堂,都必须先经历一场与历史理据的艰辛交锋。各级升学考试语文的试卷内容及评价标准是习于规训这一传统的鲜明注脚。

(二)学校母语教育应体现一定的宏观序列

母语素质养成,虽然在母语学习随在性的影响下应考虑一定的整体性,但任何素质的养成都必然有符合其内在规定的某种顺序。在我国,常规性的学校母语教育也曾几度特别重视母语教育内在序列的探索,常用词汇研究、识字教学分向实验、拼音教学程式探索、教学语法研讨、写作序列追求等,都是重视序列的表现。但这些重视,基本上都着眼于单项知识或能力的发展,而不是对母语素养宏观层级的把握。

从宏观层级上说,母语能力大致体现为规范、正偏离、控制三个纵向层面,三层级间有一定的上下兼容性,但基本层级是明晰的。母语素质养成也应体现出相应的层级性,即首先集中培养言语规范,再以此为基础有意识强化偏离,最后进行话语控制力培养。层级的培养主要通过教学时段中教学内容的不同侧重来体现。一般而言,从幼儿园到小学毕业,言语规范能力都应该作为学校母语教育的培养重点;言语修饰能力在已经具备较强的语言审美意识之后才集中培养效果更佳,普通孩子应从小学高年级或初中开始比较合适;话语控制能力的起点要求比较高,规范、美、流畅、坚定乐观的态度、语用分析能力是其良好的基础,有组织的训练从高中高年级甚至大学阶段开始比较合适^[9]。

以上述标准衡量,我国现行母语教育课程体系,比较成问题的是大学阶段母语教育。大学的母语教育应该着重于语言调控力的培养,而不要去重复中学甚至小学阶段的功课。目前的大学母语公共课,主要是普通话训练和大学语文(或应用写作)。普通话训练毫无疑问属于语言规范范畴,虽然对于来自方言区且基础教育阶段没有学好普通话的学生而言,开设普通话训练课程有利于他们形成一种新的能力,但在基本交际用语就是普通话的高等学校,普通话训练的该项作用应通过选修课或第二课堂加以实现,而不应作为一门公共课,让原本早就能熟练运用普通话的大批学生徒耗青春。由此反观,方言区应该抓住语

言规范学习的黄金期,在小学阶段加开普通话课或增加语文课时以集中学好普通话,以避免到本应培养高层级母语能力的大学还要来重补最初层级的母语素养。再说大学语文,它在国民政府时期就曾受到重视。当时开设大学语文原本就是基于对中学语文教学效果的不满意^{[10]249},而目前大学语文也普遍被戏谑为“高四语文”,可见,无论是初设之时还是多年后的当下,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一直是比较令人生疑的。另外,有些院系将应用写作取代大学语文,作为一门以格式化写作为主要内容的几乎不需太多言语智慧的课程,应用写作缺乏成为一门大学公共必修课的逻辑基础。据此,高校公共母语课程应基于并区别于基础教育阶段的母语教育,它不能再着力进行语言规范或赏析语言偏离之美,而应聚焦于以逻辑思维、语用心理、言语自信为主体内容的语言控制力培养。“语用逻辑与话语控制”或许是个可以参考的课程名称。

(三) 社会母语教育需提供多样化补偿

语言的方式就是人存在的方式。那些由于家庭文化资本薄弱及成长过程中学校教育缺憾,而没能在语言成长黄金阶段获得应有母语素养者,应该在成年之后获得补偿式的母语教育。当前网络化、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发展方向也有为成人提供母语补偿教育的诉求。预计随着文化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渴求母语补偿教育的人群总量会进一步增多。

当前,社会角度的母语能力补偿似乎集中于农民工的普通话培训^[11]。对于进城务工人员而言,普通话是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基本交际工具,虽然“他乡”感不仅仅因语言造成,但如果在日常交流上也陷入困境,文化融城、心理融城就只能沦为空谈。而根据萨丕尔(Edward Sapir)的器官适应论,“发音器官的肌肉从幼年就已变得只习惯于发生我们自己的语言的语音所需的那些调节和调节系统”,“其它调节,由于没有用过或由于逐渐淘汰,而永远受到抑制。”^{[12]39}所以对于那些第一代农民工来说,以普通话为代表的规范层面的母语补偿是必要的。而新生代农民工则基本受过中等教育,接受过系统的规范层面的母语教育,加之又成长于电媒发达、普通话推广有力度的时代,如果还对他们过多强调规范层面的母语补偿,就是一种社会资源浪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最大的困惑是因群体性

地位低而导致的语言自信匮乏,良好话语控制力的培养是增强言语自信的重要手段^[13],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的母语补偿应以第三层面的话语控制力培养为重点。

亟需获得母语补偿的社会种群决不止于农民工,而个体母语素养的提升也永无止境,从母语素养的层级结构出发重新考量母语教育的基本体系,既有助于个体在更清晰的目标下自觉发展自我母语素质,也有助于学校与社会面向不同对象构建更有针对性的课程体系。

参考文献:

- [1]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nd Education[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 [2] (瑞士)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3] 王希杰. 零度和偏离面面观[C]//钟玖英. 语言学新思维.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 [4] 谭学纯. 人是语言的动物,更是修辞的动物[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18-22.
- [5] 祝敏青. 主持人话语调控与语境[J]. 修辞学习,2006(1):55-58.
- [6] (法)米歇尔·福柯. 话语的秩序[C]//许宝强,袁伟.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 [7] 戴昭铭. 规范化——对语言变化的评价和抉择[J]. 语文建设,1986(6):13-21.
- [8]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文集(第四卷)[M]. 车文博,译. 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 [9] 曾晓洁. 现代汉语母语教育发展研究[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1.
- [10] 黎锦熙. 黎锦熙语文教育论著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 [11] 曾晓洁. 新生代农民工的母语能力缺失与补偿[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39-44.
- [12] (美)爱德华·萨丕尔. 语言论[M]. 陆卓元,陆志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13] 黄姣玲. 英语教学中母语文化迁移现象论析[J]. 外国语文,2011(2):140-144.

Norm, Deviation and Control: The Order of the Hierarchy for Mother Language Literacy and Its Enlightenment for Pedagogy

ZENG Xiao-ji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cience,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It has been biased in China for the tradition of mother language education to stress on norms, because the ideal mother language literacy covers not only the ability of rhetoric deviant and of communication control but the ability of normalization. The regular mother language education should take the order of the hierarchy as the basis of curriculum so that the curriculum contents, to some extent, are in alignment while the social mother language education should be conducted to the point for the deficiency of the educated.

Key words: mother language literacy; order of the hierarchy; enlightenment for pedagogy

(责任编辑 杨凤娥)